

信仰坚定 历经磨难 不忘初衷

——母亲李卓宝的足迹

○何晓红（执笔） 何晓杲 何晓涛



2018年7月李卓宝在家中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曾有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为新中国建设和今天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的母亲李卓宝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如今她年事已高，已不能长时间伏案写作。我们姐弟为了挽救历史，最近通过查找参阅历史资料 and 与她的对话，写下此文。希望历史能够记住他们。

造福桑梓 强我中华

母亲出生在一个华侨企业家家庭。外公早年在马来西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回到广州老家，后因国民党腐败脱离政界，致力实现工业救国和教育兴国。外公养育了11个孩子，5男6女，母亲排行最小。这些孩子中除一女早婚外，其余10人全部接受了高等教育。他把五位年长的子女都送到国外留学，我们的大姨妈先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于1936年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系。随后四个年长的舅

舅先后出国留学，李氏四兄弟在国际教育界和科学界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大舅舅李卓敏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二舅舅李卓皓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生物学教授，他是世界生物化学权威，其成果包括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并合成了人体生长激素、首次发现 β -内啡肽，首次发现并提取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三舅舅李卓萃是脑外科医学博士和哲学双博士，在美国国家卫生总署工作29年。中美建交后随团来华访问时，曾受到毛主席接见。四舅舅李卓显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冶金物理学博士，曾任Honeywell公司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和公司科学家行政主管，1980年退休后被聘去台湾清华大学任工学院院长。母亲在国内唯一的哥哥，1949的秋天，放弃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奖学金和留学深造的机会，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但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平反，身体上和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他后来移居香港和美国，但并未放弃对祖国和事业的追求，撰写了数本关于计量经济学、经济决策、经济计量模型和预测的书籍，是第一批把西方计量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先行者。

母亲在家中排行最小，所走的路径与兄长们十分不同。抗战开始后，由于外公的三家企业中有一家铜厂，日本人多次要求他开工，甚至追到澳门多次。而外



青年时期的李卓宝

公认为铜是子弹的原料，为此关闭了也可以说是放弃了他的所有产业，带着全家老小逃到澳门。母亲当时只有九岁，她十岁时第一次进入正式学堂——协和女中初中一年级读书(以前是家教)。1941年，哥哥姐姐都已离家求学，家中只剩下母亲与年迈的父母和祖母。母亲经常为家里去领救济粮，多次受到葡萄牙警察的鞭打。当时住在澳门的贫民窟，家境十分贫苦，母亲几乎中断学业。但由于母亲优异的成绩，协和女中的廖奉灵校长给她找到了做家庭教师的机会；学校还筹集了一笔奖学金给母亲继续学业。在澳门七年，母亲高中毕业，并在协和女中完成了一年师范。母亲对心理学的爱好就起源于那一年的师范教育。

母亲非常喜欢心理学，在上清华以前就自学了大量的心理学著作。在报考清华的时候，表现出对心理学方面超常的知识准备。上清华后，当时清华的生物系和心理系在一个楼里。清华心理系教授十分重视心理学的生物基础，常常告诫母亲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要对他（她）的成长环境、成长过程以及他（她）的生理状况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还鼓励学生多选学生物课，特别是脑神经学和内分泌学，为此母亲选修了大量的生物学课程。

在澳门协和女中，母亲成了一名基督徒，高一以后一直是学校的学生会会长。师范毕业以后又做了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和教师。这七年为母亲人生观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她饱尝没有国就没有家的苦难。1946年母亲被清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录取，母亲选择了清华。

忠实理想 始终如一

母亲1946年进清华时清华刚从西南联大复员回京。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在来北平之前就通过舅舅李卓萃阅读了一些解放区的出版物，母亲对共产党好奇、钦佩。在清华，母亲开始重新审视她自己的信仰，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她并未急于加入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一是她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二是她对心理学专业的执着探索。

母亲在进清华初期就参加了一系列地下党组织的如“反饥饿反内战”“沈崇事件”的游行等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组织的“一二·一”图书馆学习进步书籍，仔细地精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著作。母亲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方法所折服，她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不同于任何宗教和神学。在经过深刻的思考之后，母亲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从此信奉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直至今日。1949年2月，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初期，母亲是清华妇女工作小组的组长，妇女工作对象包括女教师、女职员、女学生和校外的妇女工作。记得母亲给我们讲解放初期做了妓女从良的工作，还为静斋女生宿舍管理员找了一个妓女老婆。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母亲参加了

□ 人物剪影

第一个在新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第一届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争取妇女权力的决议》等文件。母亲以中国女学生的唯一代表参加了会议，而后北京市第一届妇联成立，母亲被选为常委委员。1951年，母亲任清华团委副书记兼团组织部长。

母亲选择清华是出于母亲对心理学专业的执着探索。清华大学心理系是我国20世纪前半叶最有名的心理系，该系放在理学院，强调脑、神经、内分泌等人体科学是心理学的重要生理基础，要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心理学。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心理系调到北京大学，是哲学系的一个专业，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心理系，这使当时的清华心理系师生很怀念清华。解放前夕，母亲只是大四学生，当时的心理系主任孙国华和周先庚教授就给母亲在生物馆专设了办公室，让她能够单独地与不同专业的同学进行研讨并进行科学实验，希望她毕业后留校，将来接他们的班。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百废待兴，国家有更大的需要，因此母亲一生都没有能够从事她钟爱的心理学研究。

1950年，国家要求高等学校增加工农学生的成分，根据苏联的经验，在1951年9月，清华成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国家希望经过三年补课，大部分学员能够进入大学。1951年的第一批学生，288人中90%以上是党员团员，其中包括老红军，抗美援朝和解放战争中的英模，各地的劳动模范。这批人政治素质好，学习十分努力，但年龄大，文化基础弱，家庭负担重。繁重的学习压力使一些同学得了神经衰弱，中途退学，问题很多。

1952年10月，蒋南翔伯伯回到清华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针对工农速成中学的重要性和问题劝说母亲留在清华，担负起培养这批特殊学生的责任。对母亲来说，她喜欢挑战新工作，就像面对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母亲常说她一生中做了两个最重要的决定，一个是从一个基督徒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另一个是选择了清华大学这个人生舞台。而在清华她又遇到了两个有前瞻眼光和坚实理论基础的人，他们在解放后党的多次转折时期中都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一个是我们的父亲何东昌，一个是学长蒋南翔。

不唯上 只唯实

母亲一生都是用实事求是的心态来对待和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她对权力和名利很淡泊，工作中事必躬亲，始终如一，不唯上，只唯实。以下是三个例子。

1952年到1954年，母亲任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她到岗位后就开始做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学生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用三年的时间补高中课程十分困难，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大部分学生虽然学习非常刻苦，但繁重的学习任务 and 前所未有的脑力劳动使很多同学都患上神经衰弱。母亲又做了教师的调查，老师们普遍认为用三年完成六年的教学任务太困难了！母亲发现如果要改，就必须延长学制，还要改教学计划，改教材和课程设置。但这些都是由教育部定的，不能改。

母亲找了蒋伯伯，蒋伯伯十分同意并支持母亲，同意将学制改为四年，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统一改，并说“干好了是你的功劳，干不好是我蒋南翔的责任”。

在蒋伯伯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率先进行了工农速成中学的改革。后来教育部的工农教育司长来视察并把清华的经验推广全国。最后速成中学近半数以上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34%的人考入了清华大学(参加统考)。而没有上大学的，也提高了文化水平，回到工作岗位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1957年速成中学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以后就停办了，很多师资都并入了清华附中，母亲准备回北大心理系搞业务。而当时正值反右时期，基础部的领导班子和教师中很多人被划成右派。在这个十分困难的时期，母亲再次放弃了搞心理学专业，担任了清华大学基础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

母亲的工作作风都是从研究实际问题入手，她发现了四个问题。1.基础课要适应专业的问题，就是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2.基础课和应用学科的问题，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3.基础课如何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就是古典理论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4.基础课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改革的问题。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这四个问题的提出、讨论和解决实施方案，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的。1961年她为此撰文《关于基础理论课教学工作》，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对全国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清华大多数工科专业与国防有



何东昌、李卓宝学长全家福

关，因此一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教师和教授就都放在基础部。如何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国家建设培养出高质量的工科人才事关重大。听母亲讲过，当时基础课教研组有一位教师俄文水平非常高，但在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过，让他教俄文很多人不同意。母亲说基础课老师这么缺，这位老师尽管历史复杂，但已经坦白交代了。他的俄文这么好，我们应该团结、教育、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后来清华基础部的经验被毛主席批示全国，为全国高校的部分知识分子得以重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61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粮食短缺，学校发现女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十分糟糕。当时母亲是清华党委委员，蒋伯伯对她说，女同学不仅是中国未来的工程师，她们还将是共和国的母亲，她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接受任务后，母亲从调查研究入手。她发现70%的女生有闭经现象，60%到70%的女生有浮肿。母亲跟妇科主任商量诊疗方案，妇科主任说，这么大面积怎么治啊？

□ 人物剪影

太难了！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母亲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很“左”，宣传男女都一样，女同学在月经期间也不愿意说，跟男生干一样重的体力活。二是男女生宿舍的厕所厕位一样多，男生是够用，可女同学每天早上上厕所要排队，有些女生排不上就憋尿，结果就憋出病来了。三是因为经济困难，主食不够，副食也不够，营养跟不上。

母亲先去查文献。查到俄文文献上有记载，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有大量的妇女得了妇女病，原因是营养不良。但文献中没有治疗和解决方法。母亲带着校医院妇科主任和学生干部到了协和医院找到林巧稚大夫。林大夫说：“这是大面积营养不良引起的病，这么多女同学患病这么长时间可不是小事，得赶紧治疗。从营养学上说，女生跟男生吃的东西应该不一样。女生应该多吃种子类的，如豆子、花生、芝麻。你们回去想办法给女同学增加这类营养。我建议不要再让女生参加重体力劳动。另外女生不能长时间憋尿，时间长了就会憋出妇女病。”

为此母亲建议办女生食堂，增加女生宿舍厕所，在学习上和工作上照顾女生特点。这些建议得到蒋伯伯的大力支持。当时这样做阻力很大，引起的争议也不小。有些干部说不能搞特殊化，说这会助长女同学的娇气。女生也反对，说男女都一样。最后，决定先开办一个女生试点食堂。在试办过程中，母亲要求后勤给女生少供肥肉，多供豆类食品，有豆腐先供女生吃，基本上能根据女同学的特点做菜，并在主食方面增加了许多花样。过了一段时间，效果非常好，不少女同学的月经马

上就来了。基于这段女生工作经验，1965年学校正式通过了女生工作条例。

淡泊名利 学者风范

父母认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1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是与当时工科的高等教育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后，要全面实行现代化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要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办教育，这面临着两个教育制度即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西方教育制度的共性和区别问题。对资本主义教育的长处应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所选择，有所吸收。在这个大背景下，母亲感觉到有两件事她有能力做：一是建立清华教育研究机构，二是筹建清华的理学院。

1980年初，清华不少同志提议母亲进常委。父亲对母亲说：“夫妇两人都在常委不合适，周总理和邓大姐就是先例。”后来父亲离开清华，林克（1977—1984任清华党委书记）请母亲出山担任清华纪委书记，母亲拒绝了。同时其他高校也来清华调母亲去担任高校的领导职务，但她都拒绝了。母亲不愿意离开清华，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她想总结清华的教育经验。

为什么要在清华搞教育研究？从1957年到1966年，母亲一直主持基础部的工作，几乎在每次运动中，基础部都受到很大冲击，常常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当时教师们面对的问题是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的衔接。这是一个如何按照认识论的规律，理工结合，培养高级工科人才的问题。只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才有能力研究新问题，才可能创新。

蒋伯伯去世前几天找母亲去谈话。蒋

伯伯说：“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的工科技术人才，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工作还没有完成，最好能总结并上升到理论，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你创建教育研究机构我很支持赞同！”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机构大多都在师范大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础教育。清华是第一个在工科大学设立教育研究机构的。这个教育研究院与师范大学的有所不同，是研究高等教育的规律性，研究社会主义大学的特点，研究中国理工科大学的特点，研究中小学与大学衔接的问题。母亲坚持在清华办教育研究机构，因为有蒋伯伯的委托，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使命。当时没人能理解她，也没人愿意干。只有江丕权叔叔，母亲在基础部多年的同事和朋友，认同这个任务的重要。江叔叔辞掉了力学系副书记的职务，与母亲一起开始搞教育研究。

1979年10月，清华建立教育研究室。1985年11月，扩建为教育研究所，母亲出任第一任所长并任教授研究员。连续十年，她亲自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有关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试验与研究的重点研究项目，是项目总负责人。1993年，她主编的“七五”的研究成果《继承与发展：新时期清华大学教育改革试验与研究》，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她主编的“八五”研究成果《坚持与超越：理工科大学培养人才的基本特征及其途径的研究与实验》，于1999年获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清华筹建理学院，李传信叔叔(当时的清华党委书记)请母亲担

任清华理学院的筹备小组长，当时数理化等理科课程都在基础部，希望她以后可以担任理学院副院长。母亲首先重建了物理系。而复建清华心理学系则凝聚了几代清华人的努力，作为清华大学唯一一位留校的心理学系毕业生，她肩负着恩师孙国华先生、周先庚先生的嘱托。她认为，要恢复心理系首先要建生物系，为此她一直致力于恢复生物系和心理学系的工作。

1987年，在她的努力下，清华大学成立了中国高校最早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为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了帮助。后来在建立心理系时，母亲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建设性的意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母亲一生淡泊名利，直到退休仍未进入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清华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与她相同资历的人职位大多都比她高，退休后的待遇都比她好，但她一直追求的不是“官位”，而是搞业务，作为学者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贯穿始终。

一生同行 相濡以沫

写母亲不能与父亲分开，写父母不能与他们共同追求的事业和时代分开。爸爸妈妈是在清华认识的，当时妈妈是清华团委副书记，爸爸是清华党委书记。父亲的家庭与母亲的家庭有相似之处，爷爷早年公派留学日本，渴望寻求一条中国复兴的道路。父母继承了父辈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为民族和自身的历史使命走到了一起，共同的强国思想成了他们婚姻的纽带，他们荣辱与共。

我们三姐弟全都出生并成长在清华园。父母早出晚归，饭桌上吃饭是一家人最难得的相聚时光。我们家的客厅是爸妈

□ 人物剪影



1971年何东昌、李卓宝夫妇在五区家门前合影

开会的场所，妈妈是基础部的总支书记，总支会常在家里开。他们谈的话题有时候很有趣，从化学、物理的新发现，到数学和外语的教学问题。作为孩子也常被那些似懂非懂的话题所吸引。在饭桌上，80%的话题是父母谈学校的工作，在这种氛围熏陶下，和父母平等地讨论问题、交流思想成为我们家庭的一种文化。

我们真正开始了解父母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文革”中父母被打倒，关牛棚，剃阴阳头，脖子挂黑牌，坐喷气式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当时我们家的经济相当困难，父母的存款冻结，工资停发。家里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全部抄光，每个月要到生物馆红卫兵司令部去领全家的生活费，每人15元，每次去领都要遭到一番盘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被关押着，每次隔很长时间会有人来取东西，我们才庆幸父亲还活着。母亲放出来之后也都是早出晚归，在建筑工地当架子工劳动改造。冬天，北京风沙大天又冷，妈妈晚上回来满手血迹，裹满了胶布。那时晓红只有13岁，晓杲、晓涛都小。清华许多教授自杀身亡。面对这些压力，母亲仍然相信事情早晚会解决。当时我们被迁居到工人宿舍，搬进了两间15平方米的房

子，室内只有一只水龙头。公共厕所在室外很远的地方，与几十家人合用。生活上的艰苦还可以忍受，最可怜的是晓涛，当时长得又瘦又小，一出门就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孩子围观、打骂和侮辱。晚上常有一群孩子围着我家仅有的两个很小的后窗子，用石头砸。妈妈总是跟我们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妈妈一生乐观坚定，在那种困难的时候，我们晚上最高兴的娱乐方式就是听妈妈讲《水浒传》。

1972年，父母解放恢复了工作，没想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72年，全国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父母面对遭受“文革”破坏的中国高等教育忧心忡忡。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爸爸妈妈坚决恢复了基础课，加强大学生的基础训练。他们认为，教育必须循序渐进保证质量，不能违反学习的规律。1973年，由于父亲坚持教育的科学认识规律和保证教育质量的直言和执着，被作为右倾复辟思潮的代表人物第二次打倒。这一次打击比1966年要厉害得多，那时大部分干部都被打倒了，而这次像父亲这样被打倒的没有几人，因此我们家变得很孤立。从吉林回家，晓红被父亲叫去认真谈话。当时，父亲思想相当沉重，他告诉晓红这一次他可能会长期做阶下囚，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翻案了。他还说，从历史上看，坚持真理的人都是少数派。母亲十分坚定，对我们说爸爸没有错。我们还记得这期间母亲得了腹膜结核，身体非常不好，但医院被命令不给治疗！最后是靠着朋友和亲戚找来了药，父亲每天给她打针。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母亲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晓红15岁下乡，在家生活的时间最

短，和父母的联系都是通过信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下乡到出国留学，母亲总是坚持每个月至少给她写一封长信。那秀丽的小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和人生哲理，都是鼓励的语言。母亲深知教育心理学，因此在她脸上，在字里行间，看不到一点负面的东西。妈妈爸爸是我们一生中最敬佩的、坚持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干部。通过“文革”，我们看到的爸爸妈妈是一对思想上、事业上共同支持、互相理解的患难夫妻。

父母退休以后，父亲患上了帕金森病，同时因腰部在“文革”时受伤又做了手术，行动十分不方便。母亲坚持亲自

照料父亲，晚上父亲有时起夜七八次，都是母亲坚持陪父亲上厕所，每周为父亲洗澡。母亲仍然保持着她的科学态度，为父亲的病情做详细的记录和调药。父亲在病中还著书，母亲就是父亲的全职秘书、保姆、心理和身体的医护。如果不是母亲的细心照料，父亲也不会那样长寿。母亲为父亲的晚年付出了很多很多，父亲悄悄地告诉晓红，他一生有幸认识母亲，母亲所做的是相濡以沫。

在今天，也许不会有多少年轻人对这篇文章感兴趣，但我们想，总有一天人们会回过头来，发现共和国曾有过这样一代人，为了国家的复兴和富强，曾无私奉献过。

文洁若阿姨

○赵 蘅



文洁若学长

文洁若，翻译家。1927年出生，1950年毕业于清华外文系。翻译了大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曾与丈夫——著名记者、作家萧乾合译《尤利西斯》。

想写文阿姨有些日子了。不敢断定，文阿姨是不是这世上唯一

的除了阅读和写字，再没有其他物质和生活欲望的女人了？

这些年总惦记文阿姨，不定期去看看，打电话问安，寄点食品，多于登门探望。我总会先问文阿姨您好吗？她总会精神抖擞地用她多年不变的亮嗓音答道：“我很好啊！”那您在干吗呢？“我在工作。”

所谓探望，也就是立在距离大门几步远的她那张堆积如山（应该承认够杂乱的了的）的书桌旁边，因为她的家根本没凳子椅子，更谈不上让来客有沙发坐了。来人多时，我们会前头后头围着，目光都集中在她伏案握笔的桌面上。老太太签书一定要工工整整写好多字，还要盖章，太正经八百了吧，也不看看接受她馈赠的有几个的水平能与她的著作译著匹配。